

南朝宋文帝意欲北伐，武将沈庆之以为不可，极力予以劝谏。文帝不听，反让两个文官向沈庆之发难。沈庆之说，耕田就该问农夫，织布就该问织女。皇上现要出兵，却与白面书生商量，这事怎么能成呢？自此，人们就用“白面书生”代指缺乏实际经验的读书人。那些仕途失意、穷困潦倒的读书人，也常常以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自嘲。其实，这种自嘲并非出自真心，而是夹杂着抱怨和不服，一旦仕途得志，也多半不会再拿书生说事了。那么，书生真的像沈庆之说的那样不会用兵吗？

如若留意，不难发现，历史上那些用兵奇才，也有一些是书生。他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，但用起兵来却能决胜千里之外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，历朝历代都有。

远一点的如春秋时期的孙武、三国时的孔明、汉代的张良等，都是读书人中大名鼎鼎的神机军师。南朝梁有个叫陈庆之的文弱书生，“本非将种，又非豪家”，身板不壮，武艺稀松，连骑马射箭都有些吃力，可他带兵有方，用兵如神。他41岁始得拜将，15年军事生涯征战无数，从无败绩，且每每以少胜多。他所指挥的七千白袍军，数次大破北魏军。让今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，这样一位战神般的军事奇才，历史知名度却不是很高。

众所周知，宋朝重文轻武，但也不乏战功卓著的文官。仁宗年间名将张亢，最初像同时代的普通文臣一样，入仕后从地方官做起，政绩与官声颇高。后来，慨然投身军旅，成为北宋出色的军事奇才。西平王李元昊反叛自立后，不断挑起战端，北宋在西夏的凌厉攻势下连遭败绩。经范仲淹举荐，张亢临危受命，守住了西北通往关中的要地麟州。尔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，一举击溃李元昊数万精锐铁骑，史称“兔毛川大捷”。《宋史》称赞张亢：“起儒生，晓韬略，琉璃堡、兔毛川之捷，良快人意。区区书生，功名如此，何其壮丽哉！”

宋朝杀敌报国的阵容中，能征善战的文官也不在少数，如抗金名将李



文臣用兵 武将著文

□ 王兆贵

纲、宗泽、余玠、虞允文、文天祥等。更为神奇的是，以词作闻名的辛弃疾也在此列。

提起辛弃疾，有人会吟哦“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婉约绮丽，余味不尽；有人会朗诵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豪放激昂，宛然在目。辛弃疾若无战场体验，何来如此阳刚的雄词？他不仅领兵起义加入抗金队伍，亲率五十骑奇袭五万金军大营，生擒叛首张安国，而且还写过许多军事论著，陈述抗金救国、收复失地、统一中国大计。

辛弃疾就是一介儒雅书生，一个著名词人。其文笔恢宏大气，刚烈遒劲，与苏东坡并膺为豪放派的主要代表。尽管他也做过官，也曾描述过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这样壮烈的边塞场景，但却很难把他与政治家、军事家联系在一起，也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将、经邦济世的干才。他的《美芹十论》《九议》等著述令人不得不佩服他既有文韬，又有武略，确实算得上一个军事谋略家。

公元1140年，辛弃疾出生于山东

历城（今济南），其时中原沦陷已久。父亲多病早逝，辛弃疾为祖父辛赞所抚养。频仍的战乱，给他童年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并激起了他日后从军习武、驰骋疆场、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。公元1161年，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，后方民众“屯聚蜂起”，自发起义，辛弃疾也拉起队伍加入到耿京的义军中来，并在其麾下当掌书记。完颜亮南侵失败后，辛弃疾揣着耿京的书信，代表义军前往建康晋见宋高宗，奏请朝廷颁发诏书，起用义军，南北联手，共同抗击金军。奉命返回北方时，惊悉叛徒杀害耿京并降金，遂率五十骑奇袭五万金军大营，生擒叛首张安国，并号召上万士兵反正，连夜渡江南归，献俘于行在，斩安国于市，受到朝廷的嘉赏。如此勇武的事迹，一时轰动京都，人皆为之传颂。洪迈称他“壮声英概，儒士为之兴起，圣天子一见三叹息”。那年，辛弃疾才23岁。

辛弃疾南归之初，张浚北伐兵败，南宋朝中对金和议声浪又起。辛弃疾虽然职微言轻，但他胸怀大义，心系天下，对恢复中原大业充满信心，不断上书朝廷进献谋略。公元1165年，辛弃疾写成《美芹十论》。前三篇《审势》《察情》《观衅》，畅言逆

顺之理，消长之势，技之长短，地之要害，认为北方人民对金兵充满怨恨，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，有衅隙可乘，实不足畏。后七篇《自治》《守淮》《屯田》《致勇》《防微》《久任》《洋战》，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、习武备战的具体规划和策略。公元1170年，辛弃疾又写出了《九议》上奏宰相虞允文，除进一步阐发《美芹十论》中的重要论点外，还根据刘锜率吴玠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，严厉驳斥了士大夫间存在的“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”的谬论。朱熹由衷地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，并在著作中多处引用了他的论述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辛弃疾根据宋弱金强的客观现实，以战略家的眼光，在《九议》中提出了“无欲速”“审先后”“能任败”这三项克制取胜的基本原则。他一方面认为“一胜一负，兵家之常”，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丧失信心，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“欲终世而讳兵”的妥协派；另一方面又认为“欲速则不达”，昔日越王复国，20余年而后动，恢复中原也必须作长期准备，“旷日持久而后决”，反对那些“欲明日而亟斗”的速战派。他说，如今我们土地不如金之广，士马不如金之强，钱谷不如金之富，赏

罚号令不如金之严，诸多方面彼长我短，北伐之计应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“徐起而图之”。然而，天下有难，举国同慨，中原百姓，四处响应，民心所向有利于我。若能扬长避短，最终必能以弱胜强。同时，他还提出了诸如“外倾其敌，内厚其民”，宽民力以解旷日持久之费；“既谋而后战，战之际又有谋”；“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”；“小胜不骄，小负不沮”；对金“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，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，使之内变外乱”；在山东等地开辟敌后战场，以沦陷区的民众为内应等策略。

辛弃疾在《十论》《九议》中作出的形势分析，阐述的战略思想，提出的先后规划，以及他在地方任上所采取的治理方略，皆为救亡图存之良策。南宋统治者倘能听取辛弃疾的建议，假以时日，恢复中原大业并非不能实现。可惜的是，即便辛弃疾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”，却也“无人会、登临意”。辛弃疾的军事才干也曾受到高宗、孝宗的赏识，但他的持久战主张，却未能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。到头来，还一再招致反战派的非议、排挤和弹劾。几经宦海沉浮，辛弃疾杀敌报国之心却从未懈怠。但由于朝廷政局每况愈下，“烈士暮年，壮

然而，南路也是最危险的航线。如第九批遣唐使的第二船就在归程中又被吹回到中国，之后才再次出发，比第一船晚了将近两年才回到日本。再如第十一批遣唐使船，在暴风中颠簸漂流了34天，才终于漂抵福州一带。

《续日本纪》中有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海上遇难事故的可怕情景：副使小野石根等60余人在一瞬间被海水淹没，船从正中间折为两段，40多人裸着身子聚集在船尾，6天不饮不食，随船漂流。

所以，有时候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使命，同一批遣唐使团也会采取两条不同的航路。

遣唐使的多重使命

受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限制，遣唐使在跨越茫茫大海时，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，但因为他们背负着种种使命，所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一代接一代地出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。

在政治上，遣唐使背负着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使命。唐朝采取开放、包容的对外政策，与各国友好往来。自白村江战役之后，日本也积极同唐朝发展友好关系。遣唐使的派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次外交活动，其目的是希望通过频繁地出入来发出“日本声音”，以自己的国际地位。

文化上，遣唐使背负着输入唐朝先进文化的使命。唐朝文化昌盛，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。遣唐使的派遣，尤其是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派遣，很明显就是为了引进唐朝的先进文化，以促进日本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进步。为了更好地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，日本朝廷专门精选一批通晓经史、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、熟悉唐朝情况的一流人才作为遣唐使。当然，遣唐使团在唐朝也受到了盛情的接待。

经济上，遣唐使背负着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使命。日本与唐朝通过贡赐关系实际上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。这种贸易往来以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，即遣唐使贡献给唐朝赠品，唐朝则赏赐给遣唐使答礼。遣唐使贡献的赠品主要有银、绢、丝、绵、布等；唐朝回赠的礼物，主要有书籍、



彩帛、香药、工艺品等。这些赠品大多不会直接进入市场，主要是满足天皇及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，即便如此，在客观上还是对日本物质生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遣唐使的深远影响

遣唐使是中日交流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举，它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中日友好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唐朝在古代世界先进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，以及科学技术、风俗习惯等，都是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。在日本统治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革新时，遣唐使，尤其是担任国家要职的遣唐使主动谋改革、献良策，勇当政治改革的“智囊团”和社会发展的“助推器”，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，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，使日本进入了社会繁荣、文化鼎盛的历史时期。

我们可以举两位遣唐使官员的事例。吉备真备担任过遣唐副使，是从唐朝带回典籍和物品最多的一位留学生。他回日本后，在教育、礼仪、军事、刑律、建筑、历法、音乐等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，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多治比县守担任过遣唐押使，同样从唐朝带回大批文化典籍。他回日本后，像时装表演一样，穿着唐玄宗所赐的朝服朝见天皇，并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。结果，诸大臣纷纷仿效，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俗。不久，天皇下诏，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服。可见，通过遣唐使引进

心不已”的辛弃疾只好归休庄园，饮酒赋诗，相伴桑麻，寄意稼轩，“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，现如今万丈豪情都付与山林旷野。“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。字里行间发出的是大树飘零之感喟，椎心泣血之浩叹。让人惊奇的是，33岁那年，辛弃疾曾预言“仇虏六十年必亡，虜亡则中国之忧方大”。62年后，金果然为蒙古所灭，金亡45年后南宋也寿终正寝。

有明一朝，书生带兵打胜仗的人物就更多了。于谦本是文臣，国难当头挺身而出，严厉驳斥迁都“逃跑主义”，迎头痛击来势汹汹的瓦剌军，取得了京师保卫战胜利，挽救了濒于倾覆的大明江山。袁崇焕并非武将出身，临危受命镇守辽东，与以文臣入武行的孙承宗协同守备，连续几个漂亮仗打下来，后金铁骑再也不敢轻易犯边。更为奇特的是，那个以心学传世的王守仁，每当大敌当前，都能应付自如，息江西民变，抚广西边患，平宁王叛乱，真正是“深沉有大略，用兵如有神”。王守仁本无心战事，却因风云际会，让他有了三次临阵用兵的机会，而这三次机会他都抓住了，胜出了。如果说赣南戡乱、桂西抚边是预有筹谋，不足为奇，那么他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，则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出奇制胜的。明史高度评价说：“终明之世，文臣用兵制胜，未有如守仁者也。”王守仁不仅善诗文，工书法，儒佛老庄兼修，而且贯通知行合一之道，熟谙学以致用法，尤其善于灵活机动、运筹策谋，自然也能驾驭战争风云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

一个满脑子诗书礼乐的文人，所以能用兵如神，道理其实很简单：杀敌尤勇，用兵唯谋。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要素中，兵多将广、粮草丰足、军纪严明、训练有素、天时地利、民心所向等项固然重要，但若不懂谋略和兵法，再强大的军队也要吃败仗。这也是刘备为何三顾茅庐、曹操为何痛失郭嘉、孙权为何哀恸周瑜的道理所在。有道是“智者不惑，行者无疆；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”。

中日交流的重要承载者——遣唐使

□ 章 林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、最开放的朝代之一，同时也是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转为密切的一段时期。日本派遣到唐朝进行交流的使节——遣唐使，正是两国这段交流的重要承载者。

遣唐使的百年兴衰

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，日本先后任命了19次遣唐

使，其中实际成行16次，3次任命后因故中止。若再排除1次为迎接渡唐后回日本的“迎入唐大使”和3次为送还访日后回唐朝的“送唐客使”，正式派遣的遣唐使为12次。

遣唐使团官员有大使、副使、判官、录事等，成员包括掌管祭祀的主神和水手、翻译、船师、医师、阴阳师、画师、乐师、工匠以及警卫等各类人员，类别将近30种。此外，还有若干留学生和留学僧跟随使团一同赴唐。可以说，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、学术、科技、工艺、音乐、美术、航海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。

为了更好地把握遣唐使的发展演变，学者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，提出遣唐使的不同分期。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根据遣唐使的目的和内容，将其分为初期、盛期、末期三个时期。

初期从630年舒明天皇派遣第一批遣唐使开始，到669年天智天皇派遣第五批遣唐使为止。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可以说是隋朝时期遣隋使的延续，其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唐朝的制度、典章以及佛法。初期遣唐使团规模小，一般为两艘船，人数少，往往100至200人左右，组织也不严密。

盛期从702年文武天皇派遣第六批遣唐使开始，到752年孝谦天皇派遣第九批遣唐使为止。此时的遣唐使开始全面、系统地学习唐朝。使团具有相当的规模，使节阵容齐整，一般为4艘船，总人数在500人左右。为此，日本古籍《万叶集》中经常以“四只船”来称呼遣唐使团。除了数量方面的变化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质量的变化。盛期的遣唐使人才济济，如名垂史册的粟田真人、藤原清河、大伴古唐等人。此外，在遣唐留学生和留学僧中，诞生了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吉备真备、阿倍仲麻吕、大和长冈、玄昉等人。

末期从777年广仁天皇派遣第十批遣唐使开始，到838年仁明天皇派遣第十二批遣唐使为止。末期的遣唐使在规模和组织上并不弱于盛期，但不管规模多么庞大，组织多么完整，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征兆。最终，宇多天皇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，于894年正式废止遣唐使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遣唐使的衰落直至最终废止呢？综合学者们的研究，大致有以下四个因素。